第 54卷 第 5期
2001年 9月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Vol. 54, No. 5
Sept. 2001, 636~ 637

● 书 评

# “论贵是而不务华 事尚然而不高合”

## ——《王充与中国文化》读后

陈 阳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 陈 阳 (1948-),男,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 B234 [文献标识码 ] E [文章编号 ] 1000-5374(2001) 05-0636-02

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东汉的王充是一位奇人。他一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博览群书,“考论虚实”,以求“没华虚之文,反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结果写成《论衡》一书,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枝奇葩。这使得海内外学术界,既关注王充这位奇人,又关注《论衡》这部奇书;围绕王充其人其书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李维武教授的《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年 10月出版)一书,即是一部关于王充思想研究的新的力作。

《王充与中国文化》,作为一部形成于新旧世纪之交的王充思想研究专著,引人入胜之处甚多。笔者阅读此书的第一点感受是:本书作者致思趣向新颖,学术视野宏阔。在过去的 100年中,关于王充思想研究的成果不菲。较早面世的关于王充思想研究的著作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前苏联学者阿。阿。彼得洛夫的《王充—— 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田昌五先生的《王充及其论衡》等。彼得洛夫关于王充思想的著作仅 6万字,田昌五先生关于王充思想的著作也只有 11万字。这类著作不仅规模较小,视域较窄,而且从书名即可以发现作者在理论旨趣方面的时代印迹。人们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及与其相应的学术文化氛围中,带着某种思维定势去研探王充思想,是难以全面理解王充其人其学的。后来形成的关于王充思想的学术成果,特别是 1980年以后形成的关于王充思想的研究成果,规模与意境都有了发展与进步。但是,仍少有学者专门从文化的角度去全面解读王充其人其学。李著一改旧观,用新时代的学术视野、文化胸襟、理论旨趣,深探王充思想的文化蕴含,以“王充的自然观与中国文化”、“王充的人生观与中国文化”、“王充的历史观与中国文化”、“王充的知识观与中国文化”、“王充的批判精神与中国文化”等内容为全书的基本架构,全面论释王充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双向历史联结”,从而在学术视野与致思趣向两个方面,都使王充思想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

新的学术视野与理论旨趣,不仅使李著内容丰富,显得大气,也使李著对于王充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双向的历史联结”的具体论释,笔敏文沉,新意颇多。李著对王充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双向的历史联结”,是由三个层面的论释完成的,这就是:对王充思想本身的解读,对中国文化对王充思想影响的论析,以及对王充思想对后世中国文化发展影响的评判。这种论释层次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其中,对王充思想本身的解读,是李著论释王充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双向历史联结”的基础。譬如,李著认为,王充的自然观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另一个基本点是强调世界的自然性”。第一个基本点,使王充认定世界上“非物体则气也”,“不为物,则为气矣”;第二个基本点使王充肯定“天道”、“自然”、“无畏”。而两个基本点结合,则使王充的自然观注意“论自然”与“引物事”统一。李著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具体论析王充对“气”与“天”的规定,进而论及“王充与中国古代气论发展”、“王充的天人论与古代天人之辩”,清理了王充自然观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结。由于对王充思想具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作者对王充思想与中国文化联结的理解也较符合实际。李著的这种特点,我们从其对荀况、王充、刘禹锡三位思想家“天人观”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具体的

收稿日期: 2001-06-30

应证。李著认为,荀况、王充、刘禹锡三家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构成了中国古代天道自然路线的三个坐标点。荀况是较早提出“天人相分”的思想家,认定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王充虽然主张“论自然”与“引物事”结合,但王充的自然观不同于道家,也不同于荀况。王充认为,“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行”;同时王充认为人对“天”也不是战而胜之,而是自然无为。王充与荀况在天道自然路线上的差别,促使刘禹锡以“天人交相胜”的理论,对天人关系中的“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进行“双向扬弃”。这种扬弃,既显示了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也表明了王充思想与先秦学术的历史联系。李著中对王充思想这种层层递进的论释,使人增加了对王充思想理解的广度与深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深刻的学术见识。

李著中对王充思想中其他内容的论释,同样十分精彩。笔者在阅读中最有兴趣的部分,是作者对王充人生观的理解与评断。王充的人生观是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王充一方面认定:“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性本自然,善恶有质”;由“气”论性,以“禀气厚薄”,区别人性善恶。主张“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承认和肯定人性的可塑性。另一方面,王充又专辨“命”、“时”、“偶”等范畴,以“气”论“命”,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主张一种“命定说”。学术界曾将这种“命定说”作为王充思想中的消极面加以否定。李著不囿陈说,对王充的人生观重新加以诠释后认为:王充的人性论,虽属一种率性论,但强调的是人性中固有的善恶之分,其界线不是绝对不变的。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化恶为善,从原来的性恶中超拔出来;而缺乏后天的学习,则会由善变恶,从原来的性善中堕落下去”。这表现了王充人生观中的“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至于王充的“命定说”,“强调人生的受制性,认为人的才智操行不能决定人的命运,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都是由外在的‘命’与‘时’所决定的”,这表现了出身贱微、终生贫困的王充对人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情”。但王充的率性论与“命定说”是统一的。王充的一生是“困厄坎坷的一生”,也是“努力奋斗的一生”。作为汉代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王充对人生的矛盾与痛苦有着深刻的体悟和反省,这使得他“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在贫苦中不泯奋斗之志,“主张以一种理智而平静的心态”面对人世间的生活,从而以自己的人生和人生理论给后世学人带来了深刻影响,促使人们去“思考人生的奥秘和人生的道路”。李著把唐代韩愈的“性三品”说、宋明学者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以及清人戴震的人性理论都理解为王充率性论的深化,认为东汉以后出现的“顺命”说、“力命”说、“非命”说等,虽然对于王充的“命定”说所持态度不一,但实际上都可以说是省思王充“命定”说的思想结晶。这表明人们对于王充的人生理论,可以沿袭,可以重释,可以改造,但无法回避;这些“顺命”、“力命”、“非命”之说,无不从各自的层面上,显现了王充人生观念对中国后世学术文化的深远影响。

清人章学诚认为,学者治学,当“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方能够自立一家之言。因此,章氏主张在学术方法上,应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李著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颇具章氏所倡导的学术方法特色。为了详释王充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结,李著除了着力解析王充的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知识观及批判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另辟专章论释王充思想的历史命运,以及王充思想对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王充观”这一概念。认为胡适对王充思想价值的理解,代表 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王充观;蔡元培、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对王充思想价值的理解,代表了 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的王充观;吕振羽、侯外庐、赵纪彬等人对王充思想价值的理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王充观。李著中对王充思想的这种论释与定位,不仅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更集中地展现了王充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王充思想自身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凸显出作者通过本书深探王充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结的理论旨趣。

李著中还附有《王充研究著述目录》与《王充研究文献综述》。作者对有关王充研究论著收集之系统,以及对王充研究文献论述之细密,都让人叹为观止。这种附录,不仅有助于人们更详尽地了解关于王充思想的研究,而且更能衬托出作者论释王充思想时集诸家之长、“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学术追求与自信,从而也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启迪与收获。

王充在其《自记篇》中曾经说过:“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贵是”,“事尚然”,这种观念所表明的正是王充“疾虚妄”的学术风格与精神。李著作为一部解析王充思想的著作,同样贯穿着“贵是”、“尚然”的学术精神。正是这种学术精神,使作者对王充思想的解析,求真务实,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帮助人们对王充其人其学的理解进入了新的意境。因此,我们期待本书的作者,继续“贵是”、“尚然”的学术追求,形成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责任编辑　严　真)